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一些理论与实践的探讨

2004年6月初稿，2005年4月修改

摘要

经济是什么？

以最佳效率去分配和使用有限的生产因素来满足人类无限的物质追求。这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概念。

市场经济是什么？

在供求逻辑规律下的市场竞争是分配有限生产因素的最效率制度。

资本主义是什么？

有效分配生产因素是增加生产量的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办法是增加生产因素的投入量。要鼓励生产因素的投入就得提高对这些生产因素的回报。生产因素有三：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自然资源的总量是固定的，不会因回报率增加而增加；劳动力的量来自人口，只能在长线增加；唯有资本最有弹性，最能回应回报的增减。因此，提高资本的回报，鼓励资本的聚积是增加资本投入生产的最佳办法。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

既然市场经济是最效率的生产因素分配制度，资本主义又是最强劲的生

产因素创造机制，两个是最佳的配搭。

可惜，这组合存在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生产越来越依赖资本，越来越迁就资本的使用效率，忽视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资本累积会越来越集中。资本垄断生产模式，资本家支配生产决定，哪来竞争？市场供求逻辑如何发挥作用？市场经济也就名存实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

西方国家虽然明白资本垄断与市场竞争的矛盾，但他们有逻辑性和结构性的限制，很难突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可以还给我们“真正”的市场竞争。国家应该主动地创造“平坦的球场”——在市场供求的客观规律下，大量的买家和卖家在自由交易和容易进出市场的条件下相互竞争。国家也应该积极地维持市场竞争的公平，让市场的供求逻辑发挥作用，把经济纳入正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干些什么？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有两个战略方向去创造和维持“平坦的球场”：矫正过度倾斜，维持相对平坦。

1. 调控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回报率，尤其是资本的回报率，使其不超出合理的范围，杜绝垄断，为市场竞争提供平坦的球场，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竞争。
2. 提高生产因素的生产效率，包括创造新的生产模式，可使生产因素在竞争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宏观战略的重点是调节三个生产因素的回报率和提高它们的使用效

率。可用手段包括税费、法规、补贴、直接投资和技术支援。

一个中国特色的经济组织

市场经济下，每人各自为政，重点是“小我”；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大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是超越“小我”，和落实“大我”。

“合作社”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基层经济组织。它是不同于 50 年代的合作社概念。这个新的概念是综合人民公社和股份公司的优势。它的权力分配是一人一票（像人民公社）；经济分配是按每个社员的投入（像股份公司）。

在合作社体制下，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被组织起来。合作社最能推进最佳生产因素综合使用。政府可以利用其本身的运作去发挥带头作用 -- 凡政府与国企在市场购买产品和服务时优先考虑以“合作社”形式组织的供应者。这就会引起市场的反应和效尤，是个本小利大的战略杠杆。

经世济民

中国讲的是“经（世）济（民）”，有治国理民的意思，包含着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层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平坦的竞争球场和组织基层经济合作与中国古代政治家管仲（权修篇）强调发展农村、调控资本、依赖民企和下放权力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都是扎根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利益的“民为贵”之政。

本文

这是作者经济三部曲的第一篇。第二篇是“可持续性消费经济”，第三篇是“经世济民”。

前言

要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我们先得从“经济”的定义入手。什么是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资本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后，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可以干些什么？

有关“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讨论，这里用的都是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比较有突破的是有关“资本主义”的演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剖析，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讨与归纳。

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非计划经济。这种否定式的定义没有理论内涵也没有实用价值。有人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代表政府积极参与经济。这是很笼统的概念。世界上和历史上很多很多政府都积极参与经济，但那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史无前例的实验，没有典范，也没有成规。一面做一面摸索。现提出一些理论的轮廓以供进一步探讨。

经济是什么？

“经济”的定义是：以最佳效率去分配和使用有限的生产因素来满足人

类无限的物质追求。这是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概念。这概念是狭义的，重点在生产与消费（没有社会的考虑，也没有历史和文化背景）。

什么是生产因素？生产因素，也称生产资源，是生产的投入，分三项：自然资源（包括了土地），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和资本（包括机器、工具、厂房等实物资产，也包括资金）。

分配是什么意思？生产资源的分配是指每一件产品和它的生产过程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比重是怎样的。在经济学上，这些比重代表着“生产技术”。资本比重比较高的叫做“资本密集的生产技术”，劳动力比重比较高的叫做“劳动力密集的生产技术”。当然，这些“技术”的选择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

最佳效率是什么意思？经济效率分三类：生产效率，消费效率，生产和消费选择。生产效率以生产成本高低来衡量：成本越低，效率越高。是由产品中的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分量与其个别成本来决定的。消费效率的衡量是在一定的消费能力下能获得的物质满足：满足越大，效率越高。这是由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中对各消费种类和消费量的取舍来决定的。生产与消费选择是以选择多寡来衡量：可供选的生产技术越多、消费模式越多，效率就越高。因此，经济的定义是以最高效率去分配和使用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以达到最高消费效率和选择。

市场经济是什么？

“市场经济”是一个经济现象，也是一种经济理论。作为经济现象，它反映着日常经济运作中成千上万的买家想以最低的代价得到最高的享受，

卖家想以最低的成本得到最大的回报。作为一套理论，它认为在供求逻辑规律下的竞争是分配有限生产因素的最效率制度。也就是说：市场经济是最好的经济。

竞争是什么意思？首先要澄清的是，买（求）卖（供）双方讨价还价，不是竞争。只是竞争过程中决定谁胜谁败的一个裁判机制。真正参与竞争的，不是买卖双方，而是卖家之间（供与供）和买家之间（求与求）的竞争。还有，供与求不一定代表生产者与消费者，在经济运作中，生产者可以同时是买家（从其他生产者或生产因素拥有者购入）和卖家（向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售出）。在千万个卖家中，每个卖家都想击败其他卖家，把东西卖出去；而在千万个买家中，每个买家都想击倒其它买家，把东西买到手。

卖家的竞争对手是其他的卖家，竞争的对象是买家，竞争的目标是以最高的价格把东西卖出去。在同一个市场里，卖同样东西的人，就得和其他的卖家竞争同一个买家（卖不同的东西，或者卖给不同的买家，就不会构成竞争）。当然，竞争中肯定是价低者卖出。这个卖价反映出这个“成功”卖家的生产成本比其它卖家要低。生产成本低就是因为生产效率高，而生产效率决定于各种生产因素投入的量和比重，以及它们的使用效率。这就是生产模式。在竞争性强的市场里，其他的卖家看见，也就会向成功卖家学习生产模式，甚至可以改进，把生产成本弄得更低，也就是把生产因素的分配和使用弄得更有效率。因此，卖家的竞争引发出最高效率的生产因素分配和使用。

买家的竞争对手是其它的买家，竞争的对象是卖家，竞争的目标是以

最低的价格把东西买回来。在同一个市场里，想购入同一样东西的人，就得与其它买家竞争同一个卖家（想购入不同东西，或向不同卖家采购，就不会形成竞争）。当然，竞争中肯定是价高者买得。这个买价反映出这个“成功”买家对这件货物的需求和愿意付出的代价比其它的买家要高。在“经济”的定义中，人类对物质的追求是无止境的。每一个买家都要利用其有限的购买力去争取最高程度的满足。因此，他要有所取舍：购入那些东西，购买多少分量？这也就是他的“消费模式”（消费的种类与数量）。在竞争性强的市场里，其他的买家也想购入同样的东西，他们会检讨自己的消费模式，看看有没有需要改变（将购买力从其它的消费项目转移到这件东西上，或者用其它的消费来取代这件东西）来维持或者增加他们的物质满足。因此，买家的竞争会提高消费效率。

同时，买家竞争也给卖家提供了市场消费的信息（买家需求那些消费？需求量有多大？可以支付的价钱有多高？）。卖家们会按照这些信息去调整生产模式和生产成本，或者创造新的产品来满足买家的物质需求。这样，买家的消费模式与卖家的生产因素分配就连接起来。因此，买家的竞争也同样地引发出更高效的生产因素分配和使用。

要注意的是“市场”是非自觉的。根据传统经济学的理论，千万的买家和卖家在追求私利和满足的竞争中会不自觉地缔造最佳的生产因素分配。但是，人类是非常复杂的动物，就算是从“经济动物”的角度去看，人类的经济组织往往影响市场的“正常”运作。资本的组织把市场非自觉的运作盖上了一个鲜明的意识形态。

资本主义是什么？

“资本主义”认定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因素，最需要保护，最值得支持，逻辑如下。有效分配生产因素是增加生产量（也就是增加人类对物质追求的满足）的一个办法，另外一个办法是增加生产因素的投入量。要鼓励生产因素的投入就得提高对这些生产因素的回报。自然资源的回报是租金和使用费。提高租金和使用费不会增加它的总量，因为它是固定的，但或者会改变短期的开采量和使用模式。劳动力的回报是工资。劳动力的量来自人口。在全民就业的情况下，提高工资不会增加劳动力的总量，只会改变它的部署。资本的回报是利润。提高利润一定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投入生产。资本的量是无限的，可以不断地创造。而且，不同于其他的生产因素，资本是可以无限地聚集的。在三个生产因素中，自然资源不会增加，劳动力只能在长线增加，唯有资本最有弹性，最能回应回报的增减。因此，提高资本的回报，鼓励资本的聚积是增加资本量投入生产的最佳办法。

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是在三个生产因素中，独尊资本。在这个经济制度下，每一种产品和它的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比重（这是指资本与自然资源及劳动力的比重）一定会越来越高。这样，生产就越来越依赖资本，越来越迁就资本的使用效率，忽视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资本聚积会越来越集中。尤其是通过资本的“资金化”（证券化），资本的聚积就不再受时、空的限制，更能集中在资本家（资金拥有者或管理者）的手里。这现象在资本主义的西方社会里是有目共睹的，也就是资本的胜利——在生产因素的运用上，资本的回报和比重压倒劳动力与自然资源；在生产因素分配的决定中，资本家和资本管理者压倒劳动人民和生态环境。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把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放在一起，是一种综合性的意识形态。它的逻辑是：既然市场经济是最效率的生产因素分配制度，资本主义又是最强劲的生产因素创造机制，两个是最佳的配搭，加起来应得出最优的经济成果。

可惜，这组合存在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如果资本主义的逻辑会最终导致资本垄断生产模式，资本家支配生产决定，哪来竞争？市场的供求逻辑如何发挥作用？市场经济变成虚有其表，里头是资本和资本家的天地。西方政府当然明白这个。但势成骑虎。政府也往往是被资本支配。它们的处理办法是以法律去“约束”资本的垄断和聚积（“反托拉斯”法）。这也许会阻止个别产业，个别生产模式，或个别资本家的全盘垄断，但整个经济体系基本上是向资本倾斜。

如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低效率的经济，为什么西方社会的物质水平仍是如此高？“效率”不是以绝对性的物质水平去衡量，而是以生产因素的投入与物质水平的成绩的相对关系来衡量的。效率高的经济可以用较少量的生产因素去达到一定的物质水平；或者以一定量的生产因素去达到较高的物质水平。反之亦然。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资本的偏袒和对资本回报的重视，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回报自然偏低，造成这三种生产因素低效率的使用和不平衡的分配——劳动力被轻视，自然资源被滥用。今天西方的物质水平是用超额的生产因素创造出来的。比较有见地的学者早就指出，西方国家人口占世界的 20%，但是他们使用了 80% 的自然资源，积聚

了 80% 的资本。他们的高物质水平是建筑在其他国家的廉价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之上的。这个不效率和不平衡的经济模式经过了差不多两个世纪，其不能持续之势已经非常明显了。

如果中国有幸（或是不幸）用上了它们的模式，发达了，追上了它们，我们将要面对一个可怕的事实。中国的人口刚好是全球的 20% 左右，用的资源也将是全球的 80%。中国与西方加起来是全球人口的 40%，用上了 160% 的资源，那我们就要有两个地球了。有人说，如果我们不用人家的经济模式，就需要创造出真正的不同的经济模式，这是很困难的。但是，这总比多造一个地球要容易些。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就像是一个不平坦的球场，资本永远占据上风——产品中的资本比重永远在增加，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重不断在削减。产业中资本比较高的制造业压倒资本比重较低的农业；资本集中的城市压倒资本分散的农村。这样，农村的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如何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农业怎能与制造业竞争？农村怎能与城市竞争？市场经济的作用是通过优胜劣汰的竞争，去芜存菁，以最高效率的生产因素分配去满足生产和消费的需求。如果竞争的场地是歪斜的，比赛的结果（也就是产业结构，生产与消费模式等）哪会合理？

不合理的经济当然不能持续。但更可惜的是，生产因素的潜力不能发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固然被浪费，资本的力量也不能被好好地利用。也好像在一个倾斜的球场上比赛，站在上方的球队肯定要赢，怎会全力以赴？市场经济的生命有赖竞争，资本主义的最终方向是垄断。既然是垄断，又怎能有竞争？干脆叫做资本主义好了。

作为生产因素，资本实在已经变了质。经过两百多年资本主义的发展，可以说是变成了“资金主义”。最初，资本主要是机器、工具、设施和厂房；金钱主要是市场交易的媒介。但是由于在三个生产因素中，最能够增添的是资本（因为它既没有天然的限制，又容易回应市场的刺激），它也就逐渐成为了最活跃的生产因素。但是，资本是从何而来的呢？西方经济学的解释是资本来自“储蓄”。首先，如果一个人、企业、或社会的生产超过其生存所需，就会产生盈余。盈余有两个走向：一是提高消费，二是变成储蓄。（在经济学上“储蓄”的定义是“押后消费”。）这些储蓄可以用来投入生产，那就是投资；自己没有储蓄，可以借用别人的储蓄，那就是融资。储蓄的媒介是金钱（其他的媒介如粮食、珠宝等既不方便储藏，又容易被损毁）。因此，吸引储蓄来创造资本，就成了吸引金钱去创造资金。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特征是它的“资本市场”（capital market）。这市场是“资本供应者”与“资本需求者”做买卖的地方。其实，他们买卖的不是资本（机器、工具、设施和厂房），而是资金（债券、股票等一切与金钱有关的证券）。“资本市场”成功地把资本资金化，把资金证券化。今天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资金全球化：它成功地把实实在在的机器、工具、设施和厂房，甚至土地和自然资源，不动声色地融进这个无国界的、即时的、和无从监督的资本家聚集资金和支配经济的机制。“资本主义”也应该改称为“资金主义”（很值得注意的是在英语里它们是同一个名词）。

有人或会指出，资本垄断可能是历史的过程。开始成形的“新经济”强调科技和信息，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高质劳动力的回报率也不断提高。那么，资本不再是唯我独尊了，起码有高质劳动力与之抗衡。这看法轻视

了“资本市场”的厉害。它已经把劳动力，特别是高质劳动力成功地资本化了。“知识产权”就是劳动成果的产权化，进而是证券化了。西方经济学家把劳动力叫做“人力资本”不是无因的。

很讽刺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能制造了不少大资本家，但在资本垄断的市场经济中实在没有机会真正发挥资本的最高使用效率。在资本主义下，市场经济的招牌实在是有点自欺。西方国家要把它输出到中国，就是欺人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

资本主义是一个干预性很强的意识形态。它支持，鼓励和保护资本。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里头，资本垄断与市场竞争是个不可解决的逻辑性和结构性矛盾。社会主义的意识是国家致力于社会公义。放在经济层面上就是国家积极地指导和维持市场的公平，也就是公平竞争。什么是公平竞争？公平是针对竞争的过程，而不是竞争的结果。市场经济的理论假定是：如果市场竞争的过程是公平的，那么，产生出的结果应该是最效率的生产因素分配和使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还给我们“真正”的市场竞争。市场竞争需要三个客观条件：大量的买家卖家（越少的买家卖家，就越容易构成垄断），自由的交易（不自由的交易就破坏了供求的逻辑），和容易的参与或者退出市场（高难度的进入和退出就约束了竞争的积极性）。当然这里所谓“大量”、“自由”、或“容易”都不是绝对的。只可以说越是大量，越是自由，越是容易就越能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定义应该是国家主

动地创造和维持“平坦的球场”——在市场供求的客观规律下，大量的买家和卖家在自由交易和容易进出市场的条件下相互竞争。

有些西方经济学者会指出，市场经济所需的公平竞争条件是“第一理想”（first best），大家都知道不能完全达到。我们只能去追求“第二理想”（second best），也就是“尽量”达到这些公平的竞争条件。更有人指出，西方也搞“平坦的球场”（例如“反托拉斯”法，自由贸易法等），与中国有什么分别？关键是这些第二理想“理论”或“反托拉斯”手段都有先天性的缺陷，注定失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不平坦球场”是逻辑性的。如果要真正平坦就要放弃资本主义。它们的“不平坦球场”也是结构性的。西方政府的老板和主顾是资本，怎能打破自己的饭碗？因此，西方政府的“反托拉斯”永远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门面功夫。就算从狭义的经济定义去看（撇开了社会和文化层面），西方国家追求平坦球场是自欺，因为资本主义的理想（垄断）与市场经济的理想（竞争）无法共存。社会主义可没有这些矛盾和掣肘。在逻辑上，公义的社会和公平的竞争是一致的。在结构上，政府没有欠资本（家），政令也无需偏袒资本。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国家（政府）是“无为，无不为”。如果市场经济运作正常，国家干预只会降低其效率，因此，国家应该是“无为”的。但是，要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就要创造和维持公平竞争的条件，国家应该是“无不为”。“无不为”是为了达到“无为”。中国大，政府不能什么都管。选择去管些什么是政治智慧。“治大国，若烹小鲜”——煮小鱼不可多搅动，否则鱼体糜烂；治大国，不可禁令繁多，否则伤扰民生。与其去干吃力不讨好的计划经济，或者去硬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倒不如“四两拨

千斤”地花一点力量去维持市场竞争的公平，让市场的供求逻辑发挥作用，把经济纳入正轨，这才是长治久安之策。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干些什么？

公平竞争有赖“平坦的球场”。它是怎样创造出来的？现代经济体系里千万种产品、产业和生产模式。互相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既有排挤也有互补，很难弄清楚谁是垄断者，谁在支配谁。但归根结底，都不离开生产因素的竞争（生产因素的拥有者互相竞争，生产因素的使用者互相竞争）。只要落实生产因素之间的公平竞争，就会有最高的经济效率（生产效率、消费效率、和生产与消费选择）。

生产因素竞争的球场从来就没有平坦过——资本主义偏袒资本；封建主义偏袒土地。现在，西方很多环境保护主义者表扬的中世纪紧密型城市和密集型农业其实都是典型的“土地性经济”现象，由土地拥有者垄断，与现代的“资本性经济”的资本拥有者垄断是同辕异帜的“偏袒型经济”。偏袒任何的生产因素都会导致低效率的分配和使用，就算是被偏袒的生产因素本身也会因为没有竞争压力而不会发挥最高效率。

平坦的球场是个相对动态的概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政府（作为全民利益的代行人）有两个行动方针：矫正过度倾斜，维持相对平坦。

现今世界大势肯定是资本垄断和资本集中。中国不能脱离世界经济，尤其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其实所谓“世界”者主要是指西方）。可是，资本垄断和集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它的掠夺性是永不会休止的。而且，资本已经是没有国界，没有国籍。中国与外国的资本拥有者

都不能摆脱这个逻辑（爱国资本家或许有之，爱国资本却是不可能的事），直到资本支配全世界，或因为不能持续而崩溃。中国的经济政策动向将决定世界的经济命运。如果中国拥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包括打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旗帜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则只会加快它的崩溃。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势不能持续，崩溃是早晚的事情，关键是崩溃的过程：可以是灾难性的，也可以是渐变性的，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为人为己。

1. 中国不投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怀抱，自己可以有较大的空间去发展比较良性的经济模式；世界可以有较长的时间去寻找生路。
2. 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自己创造符合国情的可持续发展；为世界提供经济模式的选择。

生产因素的分配与它们的回报率是完全对应的。回报率越高，供应就越充足。这是市场经济供求的逻辑使然。中国目前的问题鲜明地显露出这个逻辑。处理这些问题的宏观战略也应利用这个逻辑。

1. 资本（资金）的回报率偏高。（世界哪处有持续多年超过 20% 的资本回报率）。外资涌进来，内资不溜出去。因此，资本（资金）量不是问题。问题是游资（热钱）太多，找不到合适的生产出路。如果不替这些游资找到出路，会造成金融危机。

但是，个别地方政府仍然以廉价土地，廉价基础设施，优惠税收政策去试图吸引资金。从客观角度看，这是“零和的游戏”（zero-sum game），不会增加任何资本的投入，只会造成浪费。不按市场逻辑吸引来的资本，必定不会被高效率的使用。有人会指出，中国的民间储蓄虽然不少，但投产的却很少，因此，资本不足仍是问题。可是

这问题的关键不在“经济”，而在“制度”。在中国，大家都看到回报高，但也看到风险大。而且，这些风险不是市场的风险，而是制度的风险。由于资金市场和产权制度不健全，投资者得不到可信赖的保障。因此，谁都不想拿钱出来投资。而且，虽然民间的总储蓄量大，但个别升斗市民的储蓄有限，需要有集资渠道才可发挥作用。要解放这些“冻结”的储蓄，就要对症下药，降低制度风险，提供人民可以信赖的集腋成裘的投资机制。（详细讨论见下文“一个中国特色的经济组织”。）

每一件产品的生产、销售和消费都是需要时间的（新的产品需要更长的时间）。因此，新的资本（或资本的更新，例如国企的更新）是需要时间来吸收和消化的。不可能一步登天，更不可能因部分地方和企业的困难而放松宏观调控。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消化不断涌进和不断自创的新资本。中国的问题是消化不良（病症是热钱投机，扰乱资本的合理分配），不是贫血。世界经济的大势已经完全被资本支配；中国的经济体制也开始倾向资本。因此，资本（资金）降温，引导游资投入生产，和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都是宏观经济战略需要坚持的原则。

2. 劳动力（包括体力和脑力劳动）回报率偏低。人力和人才外流：流向城市，流向沿海，流向外资企业。

目前，最高品质的劳动力部分想跑到国外去（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但是，留在中国或在将来会流回中国的会占大多数。因此，长远来看，问题不会太大。城市里的劳动力数量会继续增加

(部分是来自农村但主要是当地人口的增长),但素质参差不齐,工资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农村最糟糕,高素质的人才被城市吸走了,低素质的留下来没事可做。

工资(劳动力的回报)反映了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来说,高工资的职业很少,低工资的职业很多,这反映了高生产效率的劳动力很少,低生产效率的劳动力很多。如果未来的经济增长是以资本为主导,一般劳动力的素质不会有大的改进(但会制造出一小撮为资本服务的精英劳动力,他们与其他劳动力的工资差距会更大)。这种经济是不能持续的。因为劳动力也是消费者,如果大部分人都是低工资,哪里有消费能力去带动整个经济?只有劳动力生产效率高的经济才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提高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但要注意不要堕入劳动力资本化的陷阱,见上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甚么?”一节)因此,提高劳动力的回报率和劳动力素质,创造以高素质劳动力为主导的生产模式是宏观经济战略需要坚持的原则。

3. 自然资源(包括土地)的回报不能增加它的投入。但会改变它们的运作。

矿产资源的回报理应是按世界市场价格。世界市场价格部分是因为中国的需求增加而上升。这种升势会继续下去。矿产资源是不能再生的,中国的存量又不足,必须开源和节流。两者都有赖于提高矿产资源的回报。但是矿产资源的回报提高就会直接影响生产成本,间接影响资本和劳动力的回报。矿产资源回报的上升是必然的

趋势。懂得利用这趋势会带动开源节流，反之会加重滥采滥用。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提高矿产资源的使用效率。因此，创造高效率使用矿产资源的生模式是宏观经济战略需要坚持的原则。

土地是一个大问题。作为资源，农牧渔林用地的回报率低。目前的趋势是把劳动力比重高的传统生模式转型为资本比重高的西方生模式。这里包含着一个严重的误解。西方资本比重高的生模式是针对劳动力，而不是针对土地。它们以资本取代劳动力是因为它们的劳动力越来越昂贵。事实上，他们的生模式是耗地，耗能源。（这些生模式在十九世纪中至二十世纪初成型于地广人稀、能源丰富的北美。这些物质和历史条件与今天的中国国情截然不同。）采用它们的模式肯定不能提升“土地”的使用效率，反而会使劳动力过剩的农村加速崩溃。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劳动力过剩的农村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因此，提高农业用地回报率，提升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协调资本投入去创造高效率的农村土地生模式是宏观经济战略需要坚持的原则。

作为资产，建设用地的回报过高也过低，因此，其生产效率也很参差不齐。在中国，建设用地完全是政策的决定，直接影响它的回报。政府决策当然也会考虑土地市场供求的情况，但政府的考虑往往要超越市场的规律，甚至超越经济的层面。因此，政策决定往往与市场供求规律脱节。中国的土地管理情况特殊。大部分的新建设用地是在城市周围，都是由农地转过来的。上文说过，农业用地的回报本来就偏低（城市周围的农业用地现在多种蔬菜，种鲜花，

养鸡鸭等。生产效率比种粮的高一些，但是与建设用地的回报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一旦转为建设用地，价值激升。但农民到手的补贴是按照农业生产值去计算，与建设用地价值差距很大。这些差距造成了不少社会矛盾，贪污和暴富。城市土地增值归谁的问题中外都有。一般的定论是增值大部分是社会创造的，应归于社会。问题是拿多少（拿多了会窒息土地的开发，拿少了是对社会不公平），和怎样去拿（地税？增值税？一次拿？每年拿？）。中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社会公益下保证建设用地的生产效率（地尽其用）。因此，以市场的客观逻辑去调节建设用地的回报和提高它的使用效率，以法制的严正手段去征收土地的增值是宏观经济战略需要坚持的原则。

宏观政策方向

政策干预是要创造公平的竞争条件。回报率是干预的杠杆。市场的逻辑是：合理的回报会带来合理的分配。反之，会造成不合理的分配。

什么是“合理”的回报率？回报是为了吸引生产因素投入生产。“合理”的回报率就是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所需的适量（不太多不太少）回报率。这是有客观标准的。

1. 资本（资金）的回报是利润。资本（资金）的来源是储蓄。中国储蓄多，资本来源应无缺。当然，如果资本的回报率低于储蓄的利率，就不能吸引资本（储蓄）投入生产。最安全的储蓄是政府债券，而政府债券的利率一般是银行储蓄存款利率上加一到两个百分点。这

就是资本回报率的底线，再低就没有吸引力了。在这底线上回报率有多高是要看风险。风险越大，要求的回报越高。（这是指市场的风险，至于制度的风险，请看下文“一个中国特色的经济组织”的讨论。）但一般的经济投资，尤其是稳健和可持续的生产项目，回报率要求都不会超过政府债券利率加十个百分点。这就是资本回报率的上限，超越就是暴利。

2. 劳动力的回报是工资。中国普遍工资偏低。工资的下限应该足够维持生活所需（包括依赖的家属）。这是可以按照一家人的平均消费和平均劳动力计算出来的。这是政策的考虑。超过底线的工资应该以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决定（生产效率越高的劳动力工资应该越高）。这可交由市场经济去处理。
3. 自然资源。（i）矿产资源不能再生，用完就没有了。其最低回报率应该足以鼓励节约，发展代用品和恢复环境。（ii）农牧渔林资源必须再生以维持持续发展。其最低回报率应足以鼓励再生和维持生态。（iii）耕地供应难增加，但需求却不减。其最低回报率应该足以鼓励耕地保存。（iv）建设用地供应大部分是政策决定（规划），但是使用效率需要发挥，以免浪费。其最低回报率应足以刺激和保证土地发展作“最高最好用途”，亦即高密度使用，以防止城市不断扩张，侵占耕地。其最高回报率应与上面谈到的资本回报率的上限相同。

宏观经济政策的考虑应集中在两点：（i）调控生产因素的回报率，去达成合理的生产因素分配。（ii）改造生产模式去提高生产因素的使用效率。可用手段包括税费、法规、补贴、直接投资和技术支援。目的都是把竞争

球场过高的地方削低，过低的地方填高。

资本（资金）

- 1．以税收削减回报，资本降温（这个“寓禁于征”的做法。利用市场逻辑，应该效用很高。但是中国的税制，尤其是全民报税的制度，非常不足）：
 - － 提高企业利润税（部分税收可投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发展）。
 - － 加重资产增值税（部分税收可投入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发展）。
- 2．引导游资投产：
 - － 征收证券买卖费。
 - － 实施证券转手最低期限。
 - － 开发新投资渠道。
 - － 加快资本更新。
- 3．提高资本生产效率：
 - － 实施反垄断法。
 - － 限制控股公司成立。
 - － 设立创业基金，支助创业。
 - － 设立平准基金，支助小户。

劳动力

- 1．提高回报率：
 - － 法定最低工资。
 - － 法定最高工时。
- 2．提高劳动力素质：

- 设立劳动力发展基金去创造以劳动力为主导的生产模式（产品、生产程序），特别针对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
- 教育、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

自然资源

1. 不可再生资源（矿产、能源及其用地）

创造高效率使用资源的生产模式：

- 按照生产值收费去建立不可再生自然资源发展基金（部分经费也可来自上述资本回报的税收）去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推行节约，开发代用品，和恢复环境。

2. 可再生资源（农牧渔林及其用地）

提高回报率，提升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协调资本的投入：

- 按照生产值收费去建立可再生自然资源发展基金（部分经费也可来自上述资本回报的税收）去改良品种，开发多样化生产，维护生态，和开发高效率用地的生产模式（如密集农业）。

3. 土地（建设用地）

调节回报率和征收增值：

- 拍卖用地指标（这是地域性的城市与城市政府之间竞投指标。请参看“指标拍卖（竞投）的一些想法”一文）。
- 征收宗地增值税。

提高使用效率：

- 以拍卖指标所得款项设立地域性的土地使用基金去开发没有市场价值的土地和设施（如绿带、环保、生态保护）

– 加强城市规划管理（特别限令地方政府严格遵守）

这些政策会创造一个新的局面：

1. 调控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回报率，尤其是资本的回报率，使其不超出合理的范围，会杜绝垄断，为市场竞争提供平坦的球场，鼓励更多的人参与竞争。正如球赛一样，公平的游戏规则可以吸引更多的球员参加。
2. 提高生产因素的生产效率，包括创造新的生产模式，可使生产因素在竞争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正如球赛一样，训练是发掘和培养球员素质的最佳办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是通过社会主义的经济公义和政府参与去落实市场经济所需的公平竞争，突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垄断与竞争的内在矛盾。非但如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可以超越市场经济，把三个生产因素从单独的互相竞争（“个别式”竞争）提升到三个生产因素之间先结盟组团然后互相竞争（“团组式”竞争）。“团组”式的竞争既保存了竞争的原则，又发挥了生产因素之间的互补互惠，比“个别式”竞争更能发挥生产效率。又如球赛一样，有团体精神的球队最能发挥球员们的潜力。下面谈的就是怎样去组织这样的经济球队。

一个中国特色的经济组织

为什么市场经济要讲竞争？是因为“产权私有”。如果产权是公有的，竞争什么？市场经济下，每人各自为政，重点是“小我”；竞争是无数“小我”的竞争。成功的竞争者还是“小我”。不同的地方是他们打倒了或吃掉

了其他的“小我”，变成大大的“小我”。但意识形态还是私心。

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大我”。这不是无数“小我”的集结，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是“大公”的精神。但是，在一个庞大的中国经济体中实行“产权公有”就有实质的困难。谁是“大我”？个个都是；个个都不是。因此，实际上的经济决定仍是落在个别人的身上。他们也许尽心竭力为“大我”服务，但是他们不可能拥有千万个“小我”的经验、智慧、爱憎和追求。“大我”的概念变得抽象，与千万个“小我”脱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挑战是超越“小我”，和落实“大我”。“合作”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概念。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中，联手合作可以增加竞争力。西方经济也强调企业之间和产业之间的横向与纵向综合。在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合作是建设“大我”社会的基石。落实合作的机制是“合作社”。

合作社曾于 20 世纪 50 年代实施过，但随后被人民公社取代。本文的“合作社”概念兼收了人民公社和股份公司的优点，也摈弃了它们的弱点。公社的权力分配是一人一票；经济分配是人人一样。理论上，公社中每个人有同等的权力和享受同样的利益。但由于投入与利益不相关联，因此养成惰性的“大锅饭”经济文化。生产因素分配失控，使用效率也降低。相对地，股份公司的权力分配是拥股越多权力越大；经济分配是拥股越多，分益越多（当然如果公司亏本，拥股越多的也损失越大）。股份公司里股东的权力与他拥有的股份成正比。因此，大股东可以支配企业；企业的运作也会倾向大股东的利益。

合作社的权力分配是一人一票(好像人民公社);经济分配是按投入(好像股份公司)。还有，社员的股份不得转让。新社员入社需得其他社员同意。

这个理念的独特之处是把权和利分开处理。人人的权是一样，因为人人都是社员；各人的利是不同，因为各人的投入有异。每个社员都只有一票就排除了大股东的支配，也鼓励了小股东的参与；每个社员按股份分红就提高了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和吸引新资金的投入。通过民主原则去运作和按投入比例来分利，合作社就落实了“创造与保护整体利益是提高个人利益的最佳办法”的理念。这非但超越了矛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超越了狭义的市场竞争；升华了市场经济的“小我”利益，把它融汇在社会主义的“大我”精神之内。

合作社是综合劳动力与资本的经济组织（相对于独尊资本的资本主义或独尊土地的封建主义）。（i）合作社没有老板与工人的区别，因此没有劳资的对立。这节省了很多消耗精力的劳资纷争，自然也就提升生产效率。

（ii）社员都是老板，合作社的成败对他们有切身关系，因此，对经营运作自然留意。（iii）社员同是劳动者，自然有阶级感情。（iv）社员都是内行的，接近生产并懂得业务，所以知道如何对外竞争。（v）社员是“亲自操作”，所以合作社的经营运作效率自然要比工人/老板式的企业强得多。（vi）社员会乐于把储蓄投产。相对于国家债券，合作社的回报会较高；但相对于股票市场，合作社的回报会较稳：市场风险和制度风险都较低，是升斗小民集腋成裘的投资好渠道。

相对地，西方股份制度企业的管理越来越“专业”化，这反映了后资本主义的形式。名义上股东是老板，但实权已经落在专职的高级行政管理人員手上。他们真正的服务对象不是资本家的股东，而是自己。多少亏本企业的行政人员的报酬有增无减？他们是高级经济打手，有点像从前的日

本浪人，谁出钱都可以请到。朝秦暮楚，是没有忠心的。而且他们大多数是商业管理或者会计出身，对金融、税务或有认识，对收购、合并或者在行，但对企业的实际生产和运作往往是外行。因此，他们实在是“专职”而不是真正的“专业”。可是，股东们更外行。因此盲者盲从，搞的是没有实际的会计数字把戏，甚至作弊行骗。这几年来西方的假账丑闻只是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隐藏在下面的问题颇令人担忧。

合作社的社员（股东）都是行业内人，对合作社的经营运作都有确实的认识，合作社的行政与管理透明度和问责度自然强得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方针自然是以提高社员利益为主。但是“社员利益”的概念与资本主义的“股东利益”不一样。“股东利益”就是红利，是资本的回报。“社员利益”除了红利之外还有社员的福利。这包括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提升他们的生产技能，创造他们的发展机会等等以社员（劳动者）为中心的经济回报。

合作社在市场经济中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以劳动力配合资本去追求最佳的资本/劳动力综合生产效率。这非但打破资本垄断，更提升了生产因素竞争的层面。在私有制度的社会里，个别的资本拥有者，劳动力拥有者和自然资源拥有者相互竞争，目的是增加自己在生产中的比重。手段是把自己的生产效率尽量提高。从个别生产因素的角度去看，这可以达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但是，从综合三个生产因素的角度去看，各自提高生产效率并不代表最高的综合生产效率。

举例来说，农村的生产需要劳动力（农民）、资本（农具）和自然资源（耕地）。在私有制下，它们相互竞争。农民（劳动力）希望在生产中占

最高比重，当然想用最能发挥劳动力效率的农业生产模式，例如“多样式”的耕种。资本（如农具生产商）当然想用最能发挥资本效率的农业生产模式，例如机械化“扩散式”的耕种。地主（耕地拥有者）当然想用最能发挥土地效率的农业生产模式，例如“密集式”的耕种。但很明显的是，“多样式”和“密集式”的耕种，与“扩散式”的耕种是不能并存的。在资本主义下的竞争，资本自然得胜，用的也就是“扩散式”的耕种。那么，农民和耕地的使用怎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充其量只能说农民与耕地在“扩散式”的耕种模式支配下尽他们的有限效率而已。

在合作社体制下，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被组织起来。竞争是生产因素综合的竞争。再拿以上农业生产的例子来看，合作社的农民、农具和耕地都是合作使用的。它们不再是互相竞争的对手。它们的对手是其他的合作社。所以，它们会考虑如何把综合的生产效率提到最高。“多样式”、“扩散式”和“密集式”的耕种既不能并存，它们就得创造三全其美的合作生产模式。其中一个可能是采用“多样式”和“密集式”的耕种，但不是古老传统的人手耕种，而是利用资本和科技开发出“多样化”农作物和“密集式”种植，如可防动脉硬化的小麦，低胆固醇的鸡蛋，相似母乳的牛奶，耐霜寒的鲜花等等去发挥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综合生产效率。这才是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相互辉映、多姿多彩的经济。

合作社组织不是对抗资本，当然也不会向资本投降，而是反客为主，创造新的局面。在上文讨论“经济是什么？”时指出过，一件产品或生产程序中的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比重，在经济学上叫做“生产技术”。在生产因素私有的制度下，各类生产因素的拥有者相互竞争。如果资本竞争

成功就出现资本比重高的生产技术，叫“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以资本的生产效率为主导。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成为配角，为资本服务。同样地，如果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竞争成功，就出现以它们的比重高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的选择直接影响一个社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合作社的竞争是综合型的生产技术竞争。成功的合作社代表着成功的综合使用生产因素。这当然比由任何单独一个生产因素（和生产因素拥有者）支配的生产或消费模式强得多。

上文在“宏观政策方向”一节中的政策建议都是为要创造平坦的竞技场，使用的都是外在的杠杆（调控个别生产资源的回报率，和提升其生产效率），都是针对比赛的场地和条件。合作社是针对参赛者的内在素质（生产效率），以提高参赛者的素质去提高比赛的层次。好像打球，同样是平坦的球场，如果参赛的是儿童队，打出的水准就是儿童的水准。但如果是国家队，打出的水准就是国脚的水准。

资本家考虑的只是资本的回报。当然，资本家也要动员劳动力和自然资源，但是这些都是为资本服务的工具，资本回报仍是核心。劳工的目的就更加原始，只考虑如何争取最高的工酬。合作社则不同。它主要是资本与劳动力的组合（自然资源很多时已经包括在资本之内），因此，它要同时考虑资本（合作社的资本和资产）和劳动力（社员的劳动）的综合回报。这会提升合作社的竞争力。综合资本和劳动力的互补和互助去竞争比单独凭借资本或劳动力去竞争要强得多。又比如踢球，可以用双脚去踢的肯定比只能用单脚的强。

合作社中的资本和劳动力是有机的结合。无论在投入或者回报，劳与

资是相得益彰。没有白花的资本，也没有白做的劳动。因此，资本投入就会激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劳动力素质提升就会增加资本的效率。一个合作社成功了，别人看见一定想效仿它的劳资综合生产效率，进而整个社会的经济因素分配和使用效率也因此逐渐提高。有如男、女与夫妇之区别。两个独身男女始终是两个人，但结成夫妇就会生儿育女绵绵不绝下去。是谓可持续发展。

合作社是以人为本的经济体。其组织和运作突出了人性的正面价值。合作有“携手”的意思。要“携手”就不能距离太远。因此，社员与社员之间会有一定的认识和关心。这种社会性的“团结”会创造出经济“力量”。再者，生产者和他的产品之间（也即是创造者和造物之间，劳动者和劳动成果之间）的距离一定会缩短。这减少了经济的“隔膜”，加强了人类与他的造物之间的亲切，鼓舞了生产的积极性。

农村大队，城市小区，国营企业和比较大型的乡镇企业都可以结社。生产可以合作社化（可以是全部合作，例如农村大队生产合作社；可以局部合作，例如购买原材料、使用厂房、货运、经销等），消费也可以合作社化（可以是全部合作，例如城市小区消费合作社；可以局部合作，例如购买副食品、建房、维修、交通等）。

农户、工人、居民变成社员。他们可以同时隶属于不同的合作社。这些社可以按地区、行业、生活需要、兴趣等建立。社员可以用积蓄去购股，可以用未来的收入去抵押入股。也可以招引外来的资金入股。这些都可以吸纳资金投入生产，有稳定游资的作用。这些千万个规模不太小（太小则乏力竞争，包括国际竞争），也不太大（太大则构成垄断）的合作社将极有

助于建设和维持平坦的竞争球场。

结社无需改变生产形式，只用改变管理组织。市场经济在中国发展迅速，但是它的负面影响（包括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的影响）使很多人恐惧和却步。但这是大势所趋，不加入就被淘汰。与其战战兢兢，欲行又止，不如积极去创造未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给我们的选择有限：不是被资本垄断就是为资本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力挽狂澜，就需要创造别的选择。合作社的概念包含了社会主义的“大我”的精神，又有助于建设市场经济竞争所需的平坦的球场，而且这一概念在中国已经有了实践经验。它的实践不用改变现有的企业和产业结构。是一个合乎劳动人民利益并发挥劳动力量的经济组织。

合作社非单只是个经济组织，更可以成为民主制度的基石。是“大我”和“小我”之间的最佳桥梁。当然合作社不应是唯一的经济组织，而且它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的经济运作。但是它肯定可以作为一种经济组织的选择（其实，市场经济的特点就是强调选择，不但是供求的选择，也包括经济组织和教育模式的选择）。有了选择，才有竞争。

政府倡导和赞助，无需大量的投资，只需要提供组织上的技术咨询。此中，最有效的办法是政府利用其本身的日常运作去发挥带头作用。在市场经济中，“顾客永远是对的”。政府是市场中的大客户，很多人都想跟政府做生意。如果各层政府、各部委、国企在市场上购买产品和服务时考虑合作社形式组织的供应者，若是差不多就优先选用，那么，合作社就吃香了。市场也一定会做出反应，会有更多人想效法。当大家开始体会到合作社组织可带来的许多好处时，就会引发合作社热潮。这是个“本小利大”

的杠杆战略。

经世济民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定义是生产因素的分配效率。其实生产与消费并不是民生的全部。中国讲的是“经（世）济（民）”，有治国理民的意思，包含着经济、社会与政治的层面。要国泰民安就得兼顾财富的创造和财富的分配。既要经济效率，也要社会公平。

《管子》首篇“牧民”就很明确地指出：“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仓廩不实，衣食不足，就很难教民以礼节和荣辱了。

市场经济强调竞争，是反映西方产权私有的经济和个人至上的社会。中国不必完全跟着人家走，要去芜存菁。其实这些“争”，中国的先哲早就看到了，而且是看透了，并提出了解决之道。管子的“权修”篇就有独到的观察和分析，很适合中国今天的情况。“野与市争民，家与府争货，金与粟争贵，乡与朝争治。”以今天的言语述译就是“农村与城市争夺劳动力，人民（企业）与政府争夺投资，资本与粮食争夺贵贱，地方与中央争夺治理权。”管仲当然不会用什么生产因素分配、生产技术、消费模式等经济学术语，但他对问题的了解是完全精确的。

管仲提出的釜底抽薪的解决办法是比借用西方“先提高生产效率，后处理社会公平”的办法高明。既包含了西方的实证精神，又符合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仁政理想。他说：“野不积草，农事先也；府不积货，藏于民也；市不成肆，家用足也；朝不合众，乡分治也。”今译就是“要使农村不荒废，就必须把农业放在首位；要使政府不与人民争夺投资，就必须明白国家的

财源就是人民 [人民富裕，国家的税收就多]；要使资本不过于放肆，就必须做到每个经济个体都可以自给自足 [要对抗资本垄断，就得减低对资本的依赖]；要使中央不用整天花精力去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必须分权到地方。”按这些办法就“治之至也”。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也是西方可望不可即的理想。它仍在成型阶段，很容易被资本经济全球化的洪流冲倒。要站稳就要扎根。管子的战略与上文讨论的创造平坦的竞争球场和组织基层经济合作有很多不谋而合之处；都是强调发展农村，调控资本，依赖民企和下放权力。也就是扎根于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利益的“民为贵”之政。